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

周领顺 周怡珂

(扬州大学 扬州 225127; 东南大学 南京 210018)

提 要: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因译莫言的小说而名声大噪,其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功不可没,但同时因其译作部分偏离原作而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质疑。他认为偏离原作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尤其突出,与中国编辑相比,西方编辑的主体性更加凸显。从发展的观点看,译者主体性和编辑主体性的相互作用,最终维持的是翻译活动和编辑活动的生态平衡。

关键词: 葛浩文; 译者主体性; 编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1-0110-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1.017

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A Review of Goldblatt's Views on Editing

Zhou Ling-shun Zhou Yi-k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 China)

Howard Goldblatt, an American translator, becomes well-known for what he has don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But in the meanwhile, he is blamed for his deviation from the source texts in part by readers and critics. He stated that the editors' influence on shaping translation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 Western editors are showing a higher level of subjectivit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hina.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e intera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editor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e editing activity.

Key words: Goldblatt;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the subjectivity of editor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 Goldblatt)因译莫言的小说而名声大噪,其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功莫大焉。虽然国内外学界,特别是译学界对葛浩文的翻译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系统研究其编辑观的却付之阙如。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葛浩文的编辑观散见于网络、书籍、报刊、谈话、访谈之中,时间跨度大,且前后观点似有相左之处,整理起来工程量大,任务浩繁;二是因为编辑的行为之于译者翻译的行为,属于译外因素,严格地讲不算翻译内的问题,所以未引起译学界足够的重视。但事实上,开展葛浩文编辑观的研究对于翻译学

而言,将有助于指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实践;对于编辑学研究来讲,对国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编辑观的梳理和研究,特别是涉及西方编辑和中国编辑主体性的差异以及作者、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共谋”关系等方面的讨论,将有助于中国编辑学的建构和纵深发展。此外,对于编辑在翻译活动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属于翻译过程影响因素研究的一部分,总体归为 Context 研究,是翻译学社会路径研究的有关内容。

编辑是译作进入市场的最后一关。西方编辑和中国编辑的主体性表现是否相同;西方编辑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15AYY003)和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为的道理是什么;译者怎样看待编辑行为;译者和编辑、作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译者主体性和编辑主体性如何交叠互动,问题诸如此类。笔者与十几名研究生共同穷尽性地检索葛浩文的全部编辑观,现分主题予以述评,并就相关问题作答。

1 编辑的“删改”伦理与编辑主体性

西方编辑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对译作的“删改”上,“删去部分内容是英文版的编辑提出的”^①。葛浩文举例说,“再过几个月,阿来的《格萨尔王》英文版即将出版,出版社删掉一半”^②。他还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删的,其实原文我们全都翻译了。这部作品被出版社删掉一半,因为这个长篇有40、50万字,但苏格兰的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系列都要在30万字之内,甚至更短,出版社说非删不可”^③。对于删改行为,葛浩文分析道:译者交付译稿之后,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比如我几年前翻译姜戎的《狼图腾》,编辑看过译文说,很棒的作品,不过要删一些,至少三分之一吧!先删最后一章的那个论文,作者勉强同意;后来又删减文中重复的部分。现在的结果是,“英译的文学作品‘一贯’都是被这样删减的,其中葛浩文删得最厉害。现在我的脸皮也不得不加厚了,否则如何经得一再被人冤枉!”(李文静2012:59)

一般来讲,编辑删改译作,有违翻译需要忠实于原作的伦理道德。但在西方,编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加工者,也是市场的策划者和把关人,市场需求是编辑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汉译英作品尤其如此。葛浩文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也甚少做促销活动”^④。因此,在原作、译作和市场之间,编辑具有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常见的如汉语原文叙事结构和西方市场的关系,以及西方市场和读者阅读接受之间的关系等。

就汉语原作的叙事结构,葛浩文说“删去部分内容是英文版的编辑提出的。一个是删掉各章节前的引言,编辑的意思是:我们读者喜欢看连贯的故事,受不了论文式的东西。还有结尾处一大篇都是议论式对话,很难让美国人已经读完五六百页的书,再去看两百页的讲道理。此外,整本书最多减少十几页的内容。日译本是全部翻译的,上下两册,但上下两册的书在美国根本没人要看”^⑤。可以看出,美国编辑既有对西方读者普遍

不愿接受“论文式的东西”的考量,也有对小说读者普遍不愿接受干巴巴“讲道理”行文方式的考量。也因为汉语原作叙事结构方面的缘故,编辑甚至要求“调整小说的结构”(同上)。他还说过,“编辑部说读者要看的是小说内容,这些社科方面的文献不用译”^⑥。

就汉语原作叙事所表现的重复邋遢之处,葛浩文代编辑辩解道“他(指莫言——引用者)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如果人们看到小说内容被删节,那往往是编辑、出版商为考虑西方读者阅读趣味做出的决定,不是译者删的”^⑦。编辑进行删改,目的在于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增强市场的接受性。葛浩文说,“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作优劣的标准”^⑧。要找准西方的市场,需要洞察西方小说写作市场的一般运行规律。

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总体上理解编辑的删改行为。在编辑活动中,编辑不是被动的,编辑主体性客观存在,其主体性的彰显程度与市场规律的上下起伏基本一致。作为读者的葛浩文就有过深切的感受“我平时不太会看这类书,也就不会去翻。但当时,有出版社找我,推荐它,所以答应了。没想到,在美国著名的时尚网站‘每日糖’(Daily Candy)上面,还真是火了一天。那天,很多年轻人都去买这本书,销量骤增”^⑨。但译者葛浩文有时对编辑的干预不无抱怨。他曾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译者有多么困难,首先要找出版社。我们要找美国的出版社,要他们出我们的东西,出版社里面没有一个人懂中文,都不懂中文。结果怎么办呢?我要先翻个一百页左右,要写个很长的介绍。他们要不喜欢,不要的话,就是白做了”^⑩。

正因为怕“白做”,所以葛浩文对出版社便有所期待,比如他对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情有独钟,但能否让他翻译,要听命于出版社的安排,“把版权卖给出版社,出版社要选译者找我的话,我大概愿意的,因为我很喜欢”^⑪。对译者来讲,由编辑帮助选题和策划最为保险,因为编辑能够洞悉市场的行情。编辑删改是出于对市场需求考量后所采取的理性行为。或者说,译者只要将译作交给出版社,编辑就必须确保作品能够经受得住读者的检验。从这层意义上讲,编辑对作品(包括译作)所作的任何改动和调整,都合乎编辑伦理,而删改行为只不过是编辑一个突出的行为罢了。

2 译者的“忠实”伦理与译者主体性

尽管葛浩文理解编辑出于市场需求所进行的删改行为是必要的,但作为译者,他清楚地知道删改对于作者和原作是不公正的,因为按照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文本三分法,小说作为“表达型”文本,译作需要向原作靠拢,任何偏离原作之举,都可能招致读者和批评家的批评。因为担心有偏离原作之嫌,葛浩文甚至在听到人们将他的翻译称为 creative translation(创造性翻译)时,会有“刺耳”的感觉^⑩。但毕竟,“创造”一语有“无中生有”之意。“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书里也都说明过,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⑪

当然,译作偏离原作是不可避免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对客观上的原因论述得较多,如语言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译者是意志体,有其意志性。译者的意志性在行为上表现为译者的主体性,其中包括译者针对翻译目的和接受环境而采取的审时度势的行为。葛浩文说,“你是为中国人而写,我是为外国人而译”^⑫,译者为此而有相应的举动一般是能够被大众理解的。因此,“忠实”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更多的时候它反映的只是翻译本质的东西以及译者以原作为价值取向的态度和进行尝试的努力。

译者既有为翻译而进行语言文字转换和意义再现的语言性,也有综合市场因素并进行相应调适的社会性。或者说,只要译者打算让译作进入流通领域——市场,也就或潜或显地给译作赋予适应市场的商品属性。首先表现在选材上,比如,“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洋人’的眼光来看”(姜玉琴 乔国强 2014)。在翻译过程中,他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对译作进行调整,并主要表现在提高译作的可读性上。葛浩文说,“知道自己忠实服务于两方的满足感使我愉快地将好的、不好的、无关紧要的中文翻译成可读性强、易于接受甚至畅销的英文书籍”(贺维 2011: 92)。“我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来翻译,我的目标是让目标语读者与市场能够更好地接受译本。”(曹顺庆 王苗苗 2015: 128)从这个角度看,译者葛浩文甚至临时扮演双语创作者的角色。为提高可读性,在翻译策略上,译者和编辑都偏爱“意

译”。葛浩文说“‘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作。对此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悲伤也罢,事实依旧是,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葛浩文 2014a: 199)。

换言之,“可读性好”的译作是“意译”的结果,否则就可能会产生“矫揉造作、古古怪怪,有时甚至是佶屈聱牙的译文,而原作中丝毫没有这种瑕疵”(胡安江 2010: 13),这和编辑崇尚的“英文读起来顺不顺”的标准一脉相承。“佶屈聱牙的译文”是“不顺”,是“翻译腔”的代名词,它是直译的极端形式,同样为译学界所贬斥。考察葛浩文翻译语料库发现,他为了“忠实”于原作,并不乏译学界所说的“直译”,而这样的“直译”被葛浩文称为“意译”的一种,问题出在他和编辑对于“直译”的理解与译学界的理解存在出入。他和编辑反对的“直译”,即译学界所说的“硬译”和“死译”,即带有“不顺”和“翻译腔”的翻译特征。他说,“我的责任是翻译要忠实,但忠实什么?问题在这里。是忠实于一字一句吗?”^⑬他反对“一字一句”的“忠实”,更准确地说是由此导致的“不顺”和“翻译腔”。葛浩文忠实于原作的“意译”是在“忠实”或“直译”基础上又在语言上进行变通处理,使译作具有可读性,和译学界所说的非极端形式的“直译”并无二致。比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翻译:

葛浩文意译文: Marry a *chicken* and share the coop, marry a *dog* and share the kennel.

陆谷孙直译文: If you marry a *chicken*, follow the *chicken*; if you marry a *dog*, follow the dog.

在译学界看来,葛浩文的“意译”是译学界认可的“直译”,因为原文的主要意象“鸡”和“狗”都保留下来。葛浩文的“意译”和陆谷孙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给出的直译文(保留原文意象“鸡”和“狗”)不分高下。

《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意译文是: a woman should mould her lifestyle after that of her husband's, 与葛浩文的“意译”相差天地,因为主要意象“鸡”和“狗”消失得无影无踪。

译者葛浩文“意译”的出发点是“忠实”,但又反对在语言形式上对原作的亦步亦趋。直译可能产生“不顺”,但语言上不顺的,可以适当变通,却仍归于直译的范畴。“变通”强调的是语言上的“创造性”。“创造性”并不是贬义词,而是“遇到原语所有、译语所无的语言现象,译者若能融会贯通,既准确达意,又不露‘翻译腔’,就能创造出令

人喜闻乐见的译文语言”(孙致礼 2003: 28)。这种直译基础之上的创造性和葛浩文所说的“只要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⑥即“意译”的做法是一致的。

“直译”和“意译”不是“异化”和“归化”的翻版。翻译实践证明,“直译”和“意译”是面对原文意义的解读策略,哪种译法对原文意义的解读更好,那么它便是更正确的做法。“异化”和“归化”是面对市场的营销策略,不管“洋气”还是“土气”,哪种做法更能赢得市场,那么它便是更好的做法。

3 作者、译者、编辑间的“共谋”

作者、译者、编辑间的相互妥协最终演变为一场“共谋”(collusion)(Bassnett 2001: 26)。作者应有的态度是强硬维护自己作品的态度,不管是内容上,抑或是在风格上,莫言当初面对国内编辑的态度即如此。葛浩文说“莫言的编辑把《丰乳肥臀》交给我时说,莫言交稿时跟他说,一字不动。40万字的一个长篇,一个字不能动,所以当编辑的就苦了。后来我翻译的时候也就一字不动。但后来英文版出版社的人还是删了一点,但是不多,最后出来好像是550页至600页”^⑦。但当莫言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传播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葛浩文说,“他(指莫言——引用者)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应。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刘莉娜 2012: 7)。葛浩文说莫言总是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⑧。他要将自己的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出去,对于他而言,译者和译者背后的编辑,是他首先面对的异域市场。如果过不了译者和编辑这两关,他就无法实现打开西方文化市场的目的。葛浩文说,“莫言的小说也一样,都不是我决定的。其中一两本被删去十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我还争取又加回去一些。但莫言对此没有意见,他说‘反正我看不懂’”(李文静 2012: 59)。这种态度和作家鲁迅当年拒绝参加“诺奖”的精神南辕北辙,鲁迅是因为“诺奖”的评委们不懂他的汉语原文而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颅。因为作家有走向国际的愿望,所以葛浩文说,“莫言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让他成为国际作家,同时他也了解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未必在其它国家会被接受,所以他完全放手让我翻译”^⑨。不过,“诺奖”的评委们为尽量

公正,“看的不一定是英文版,有的是瑞典版,有的是法文版,从这点上来说,翻译的贡献毫无疑问,但最后还是要归到作者本人”^⑩。

作者和译者的“共谋”还可以从葛浩文说的“如果作家和我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就会试图跟他沟通,商量好到底改还是不改”(付鑫鑫 2011)、“我征求过作者的同意,就这样删了”^⑪、“经过原作者与译者同意,出版社删了多少字”^⑫等加以佐证。他还举例说,“经作者同意,对《红高粱》进行一些删减”(孟祥春 2014: 75)。他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发现,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在,接着又回到30年前。他说,“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⑬。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作者的同意。他还说,“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译者的努力,就不会有各方满意的结果。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曾被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 King)译成英文。但未经作者同意,译者按照个人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改动原作,将悲剧的结尾改成大团圆结尾,译本的结局是祥子和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抢出来,喜结良缘。这使老舍先生十分不满,后来又请施晓菁女士重译该书而不承认伊文·金所译为他的作品。(吕俊 侯向群 2001: 20)“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朱自奋 2014)在合作的过程中,观点既有一致,也会有碰撞。但出于作者和读者双方的考虑,理性的译者,其所作所为必定也出于理性。

译者和编辑的“共谋”发生于整个翻译的过程中,其间还要不断地与作者协商。这是译者在“忠实”原则下,确保市场阅读效果的一个有效手段。比如对于原作结构上的调整,就属于根本性的调整,需要征得3方的同意。葛浩文说,“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结尾有些不了了之。我把编辑的看法告诉莫言,10天后,他发给我一个全新的结尾,我花了两天时间翻译出来,发给编辑,结果皆大欢喜。而且,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这个新的结尾”(李文静 2012: 59)。即使译者本人,有时也要充当编辑的角色,将译者的主体性和编辑的主体性融合在一起,“有时译者还要修改已经出版的文本,也就是再次编辑,一般是出版社经编辑提出后才要修改的”(葛浩文 2014b: 38)。葛浩文说,“我是改过,但没有把书改坏,这是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让他

们第一眼就觉得这小说不错。有人说我把书改坏了,这是侮辱我”^⑤。“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写的事都不够完美,因此译者必须承担起编辑的责任去把译文变得更加有可读性。”^⑥这与他坚持的读者第一的原则相一致,而他的有些改动纯粹是对原作负责的所为。他说,“如果保留错误,他会觉得对不起读者,毕竟原著出错了”(付鑫鑫 2011)。所以,对于译者而言,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一直在如何向原作求真意(“求真”)和如何务实于市场(“务实”)间努力维持着一种理想的平衡,“这种理想更多的是译者综合各因素而平衡出来的、自我认可的结果状态”(周领顺 2014: 32)。译者努力在结果上使各方满意,在过程中,以各方的“在场”作为良性互动和解决问题的前提。说到底,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体现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

4 译者主体性与编辑主体性之间的“生态”

葛浩文说,“在西方,有天赋的编辑往往和作者反复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从编辑的视角、品味、经验及其对市场了解出发,对作品进行编辑、完善”(孙会军 郑庆珠 2011: 91)。他还指出西方编辑与中国编辑的不同“一部作品从书写、出版到被读者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他们的胆子都太小,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了了不起的编辑在帮助他们,翻开西方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对编辑的致谢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翻译成其它语言后,才会得到外国编辑如此的待遇,但这些外国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他们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⑦。他站在不同角度,见证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编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时有交叉,既证明译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和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也证明作为意志体译者的意志性贯穿于整个的翻译过程。

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属性(周领顺 2014: 1),而编辑主体性的张扬能加强译者的社会性,而使其更加社会化。根据译者行为批评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在向原文意义“求真”的过程中都有兼顾“务实”的考虑,且表现为“求真为本,务实为上”的一般性行为规律(周领顺 2014: 102)。译者的“务实”在语言内主要表现为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以赢得读者的青睐;在语言外主要表现为采取归化的做法,以

期减少原文的文化陌生感,快速促发与读者的互动,但也有较大的变动,比如删节原文,降低出版物的厚度,节省读者的购买投入等考虑和相应的行为。但译者毕竟不是出版机构(以编辑为代表),并未做过充分的市场调查,因发言权不够,所以译者的话语权就不及编辑的多。译者和编辑“都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都希望把作品更好地推介出去,取得较好的传播、接受效果,以及一定的经济回报”(覃江华 梅婷 2015: 77)。

不管是译者主体性抑或编辑主体性,任何一方过于凸显都可能演变为“主体凌驾性”,如“过分迁就市场和出版商与编辑的权力操纵,有可能造成对原语文化的暴力侵占,也可能助长英语读者的文化自恋情结,从而加深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等”(覃江华 刘军平 2012: 49),所以“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缺乏编辑和过度编辑都是不合理的”(覃江华 梅婷 2015: 78)。从发展的观点看,来自译者和编辑两种力的相互作用,最终会走向一种平衡,即维持翻译生态和出版生态的平衡,在西方市场如此,在中国市场亦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生态”只是一个中性词,它的深层意义是“平衡”,所以译学界所说的“优胜劣汰”,无非是一个平衡系统,“优胜劣汰”,但汰之不绝,便是明证,而“劣”者,也是“适者生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注释

- ① “《狼图腾》译者葛浩文:中国文学欠缺个人化” <http://cul.sohu.com/20080325/n255905547.shtml>.
- ② “葛浩文英译《废都》澄清未修改莫言小说结局” http://www.taiwan.cn/wh/dsw/whwtxx/201310/t20131017_5047827.htm.
- ③ “‘诺奖推手’开始翻译毕飞宇《推拿》” <http://www.translators.com.cn/archives/2013/10/7669>.
- ④ “葛浩文讲真话:中国小说在西方不特别受欢迎”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4-23>.
- ⑤ “《狼图腾》译者葛浩文:中国文学欠缺个人化” <http://cul.sohu.com/20080325/n255905547.shtml>.
- ⑥ “秦颖摄影手记 24:谁是葛浩文”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80786>.
- ⑦ “葛浩文谈中国文学” <http://www.infzm.com/content>.
- ⑧ “葛浩文讲真话:中国小说在西方不特别受欢迎”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4-23>.
- ⑨ “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 <http://culture.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10614/newgx4df75163-3875241-4.shtml>.

- ⑩“葛浩文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http://book.sina.com.cn/news/a/2009-04-07/1054253551.shtml>.
- ⑪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9-04/05/content_122968.htm.
- ⑫<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7-07/113094803.shtml>.
- ⑬“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7-07/113094803.shtml>.
- ⑭“秦颖摄影手记24:谁是葛浩文”,<http://www.bookdao.com/article/80786/>.
- ⑮“葛浩文英译《废都》澄清未修改莫言小说结局”,<http://cul.sohu.com/20131017/n388351495.shtml>.
- ⑯<http://fanyi.baik.com/article-1332759.html>.
- ⑰“葛浩文英译《废都》澄清未修改莫言小说结局”,<http://cul.sohu.com/20131017/n388351495.shtml>.
- ⑱“葛浩文谈中国文学”,<http://www.infzm.com/content/6903/>.
- ⑲“想当莫言,先得“巴结”翻译?”<http://news.163.com/12/1102/07/8F9PD38300014AED.html>.
- ⑳“翻译家葛浩文:莫言不会外语不利于宣传”,<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3/2013-10-15/177416.html>.
- ㉑“《狼图腾》英文版首发:让世界感受狼的精神(3)”,http://book.sina.com.cn/1081912348_wolves/author/subject/2008-03-14/1030231543.shtml.
- ㉒<http://cul.sohu.com/20131017/n388351495.shtml>.
- ㉓“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阅读答案”,<http://www.gkstk.com/article/73357534.html>.
- ㉔“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阅读答案”,<http://www.gkstk.com/article/73357534.html>.
- ㉕<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3/10/16/1079116.shtml>.
- ㉖“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西方接受——以英语视界中的《狼图腾》为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e0f010100qyv5.html.
- ㉗“中国文学正在疾步走向世界?”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487e10102uwvt.html.
- 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 付鑫鑫. 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N]. 文汇报,2011-06-14.
- 葛浩文. 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a.
- 葛浩文. 葛浩文随笔[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b.
- 贺维. 《师傅越来越幽默》英译本中的语境顺应[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11).
-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2010(6).
- 姜玉琴 乔国强. 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N]. 文汇报,2014-03-13.
-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2(1).
- 刘莉娜. 译者,是人类文明的邮差[J]. 上海采风,2012(12).
- 吕俊 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孟祥春.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2014(3).
- 孙会军 郑庆珠. 从《青衣》到 *The Moon Opera*——毕飞宇小说英译本的异域之旅[J]. 外国语文,2011(4).
-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覃江华 刘军平. 一心翻译梦,万古芳风流[J]. 东方翻译,2012(6).
- 覃江华 梅婷. 文学翻译出版中的编辑权力话语[J]. 编辑之友,2015(4).
-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朱自奋. 葛浩文: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的关系[N]. 文汇报,2014-01-08.
- Bassnett, S.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A]. In: Bassnett, S., Lefevere, A.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曹顺庆 王苗苗.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

定稿日期:2017-11-12

【责任编辑 王松鹤】